



泰山天街。 通讯员供图

圣者仁山 (下)

□鹿铎

泰山佳作

孔子与泰山，一个是“圣中之泰山”，一个是“岳中之孔子”，虽分处不同领域，但在其地位、形象、内涵、精神等方面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七

孔子在古代尊奉为“至圣先师”。除去在鲁国四年的从政经历，孔子将一生的主要精力倾注于以授徒讲学培养那些有信念、有责任、有情怀的仁人君子。

孔子把理想人格分为圣子、仁者、君人三个层次：圣人指尧、舜那种能安定天下的人，仁者指微子、伯夷那种能修己安人的人，君子指那些能通过不断修习逐步近“仁”的人。圣人、仁者是做人的理想目标，而培养君子则是教育的现实目标。孔子将儒分为“君子儒”“小人儒”两类。“小人儒”是指那些只具备某些专业技能的人，而“君子儒”则指那些既具专业技能又能心系天下的人。孔子所要培养的不是仅有“成器”之用的“小人儒”，而是具有“不器”之才的“君子儒”。

孔子认为培养君子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于君子而言，志于道，就是确定生命目标，追寻天地大道；据于德，就是寻求处世依据，建立人生基础；依于仁，就是坚定成长态度，能够达人律己；游于艺，就是致力精神丰满，实现人格提升。

君子所需要的技能有“小六艺”和“大六艺”。“小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大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与古希腊育人所注重的文法、修辞学、雄辩术、算术、几何、音乐、天文“七艺”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小六艺”和“大六艺”中，孔子尤重诗和乐。诗是陶冶性灵人格的方法。相传孔子曾多次到访位于大汶河南岸的泰安市宁阳县鹤山乡，《诗经》中“关关雉鸣，在河之洲”所描写的大汶河此段的美好景象。诗教的效用在于可以用诗“兴观群怨”：兴是比类，是热爱社会的艺术表达；观是洞察，是了解社会的世间情怀；群是交流，是融入社会的聚合互

动；怨是批评，是劝喻社会的独立人格。

孔子把乐教作为教育的最高境界。孔子精通乐理，善于弹奏，有着很高的音乐素养。他描述乐曲演奏的四个阶段：“翕如”“纯如”“皦如”“绎如”。“翕如”为开场，乐器合奏，氛围热烈；“纯如”为展开，诸音舒展，纯净和谐；“皦如”为起伏，节奏分明，抑扬有致；“绎如”为尾声，余音袅袅，连绵不绝。春秋时期，最有名的音乐有六种：黄帝之乐“云门”、唐尧之乐“咸池”、虞舜之乐“大韶”、夏禹之乐“大夏”、商汤之乐“大濩”、周武王之乐“大武”。孔子访齐时，在今临淄古城东南的韶院村听到韶乐，竟沉醉其中，一连3个月吃红烧肉都食不知味。

生活中的孔子也有着生动的个性。他有说有笑，也时常发脾气，训斥人；他喜欢美味，喜欢音乐，生活中颇有些小资情调。孔子的弟子也各具特点，如颜回忠厚，勤奋扎实；子路性急，快人快语；子贡富有，办事通达；还有子路自负、子夏严肃、冉求多才等等。在那个虽礼崩乐坏但又充满生机的时代，这些英才豪杰都有着活泼的真性情。

八

孔子与泰山的机缘并不仅仅表现在孔子言行与泰山的交集。孔子与泰山之间更为深刻与根本的通契在于孔子思想与泰山形神的气象相类与气质相合。

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期，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年至1969年）称为人类文明史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古希腊、印度、以色列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对人类历史发展影响深远的伟大思想家，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以及中国的老子、孔子等。这些文化巨人奠定了东西方文化的基础，构建了两千年来不断延续发展的人类文化传统。

两千多年前，东西方的思想家们都还没有形成以著述方式传播知识及思想的习惯，如现在所见孔子、苏格拉底的著作都是后人对他们言行的记录。孔子的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编成于战国早期的《论语》之中。《论语》之“语”为言

语，主要指孔子与其弟子的问答谈话；“论”字有编纂之义，指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下来编纂成书。现有《论语》20篇，492章，不计重文，计15836字。

《论语》是第一部儒家经典。识字不多的北宋开国功臣赵普对《论语》推崇备至，颂称“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乃至东方的价值观念、思维结构乃至语言方式。从总体上看，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更注重在对自然界的观察中，进行概念的辨析判断和逻辑的归纳演绎；而孔子等思想家则更擅长形象直观的类比与对立统一的综合。

九

孔子与泰山，在历史的时空中相遇相生，相辅相成。

因为孔子，泰山方得其“仁”。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让泰山成为仁者德性的表达意象。

“泰山其颓乎”中的泰山是通乎天地的生命气象。孔子对鬼神等未知事情不肯定、不否定、不问询、不评论的态度，使人们对孔子的天命观众说纷纭。但无论孔子有什么样的天命观，泰山之于孔子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孔子十分尊崇敬重泰山。在孔子看来，泰山具有超然意志和神奇力量；每个人在泰山面前，都应知天命、畏天命、履天命。即便是在生命将要走到尽头的紧要时刻，孔子首先念及的仍是泰山。泰山是孔子心中的天命泰山。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中的泰山是寄望山川的家国气象。泰山是鲁国北线的天然屏障，更是鲁国人的精神高地。由“泰山”到“鲁邦”，由一山而一国；由“岩岩”到“所瞻”，由视觉及心态。伴随由山到国的场景移迁，景观直觉转换为心理认知，自然审美升华为深沉情怀。两行诗句，一山为镇。泰山寄寓了鲁国人观天志、循物理、体人道的美好愿望，承担了鲁国国泰民安的福佑希冀。泰山是孔子心中的家国泰山。

“登泰山而小天下”中的泰山是仁人君子的人格气象。“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泰山是立身从道的德性视角；正己成仁必须立高起点，具大眼光；知大世界，有大胸襟；得大格局，至大境界。泰山是孔子心中

的人格泰山。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孔子此言虽非特指泰山，但泰山具有孔子所言之“山”的典型特征。为什么是“仁”对应“山”、“智”对应“水”，而不是“仁”对应“水”、“智”对应“山”？这关乎“仁”与“智”的内涵、“山”与“水”的特性。就物理特性看，山是稳固的、高耸的、默然的、宽博的，而水是流动的、低伏的、喧哗的、随形的。智者的品格匹配于水的权变、致密、畅达、持续，而仁者的品格则更像大山一样厚重、正直、沉静、包容。所以孔子进而讲，仁者久长，可得长寿；智者悦人，可得快乐。孔子在泰山找到了人与自然的节律同构，找到了臻于至善的进益途径，找到了“五常”达德的自然之象。

因泰山，孔子更显其“圣”。孔子当世虽不得志，但死后却殊荣日隆。尤其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孔子不断被膜拜圣化。汉平帝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至东汉，祭祀孔子已成为皇帝的必行公事。从汉明帝起，学校祭祀孔子成为常规。北魏时期孔子被称为“文圣尼父”。隋文帝赠孔子“先师尼父”称号。唐玄宗加封孔子为“文宣王”。宋代前加“至圣”二字，成为“至圣文宣王”。元代又前加“大成”二字，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代，孔子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清代顺治皇帝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来又称作“至圣先师”。

泰山上较大规模祭孔设施的兴建始于明朝。嘉靖皇帝之前，泰山上的祭孔设施比较零星散乱。1560年，山东巡抚朱衡在泰山登山起点处建“孔子登临处”石坊，并同时谋划在岱顶修建孔子庙。经过前后27年的断续施工，孔子庙最终于1586年建成。孔子庙取学宫形制，供奉孔子及颜回、曾子、子思、孟子。1637年，山东御史颜继祖在岱顶立“孔子小天下处”石碑。泰山祭孔格局基本奠定。清代对孔子庙等祭孔设施进行修葺增建。近代以后，孔子形象几经大起大落，但孔子在泰山祭祀中的地位却随时势更易挫而复坚。

孔子，圣者；泰山，仁山。孔子与泰山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双重图腾。（完）